探索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战略研究

深圳岭南公共管理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目录

前言 1

一、深圳新经济发展现状与环境 2

（一）发展现状 2

（二）存在问题 7

（三）发展机遇 9

二、深圳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的意义 11

（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 11

（二）打破高质量发展制度藩篱的重要契机 12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战略的重要举措 12

（四）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13

三、国内外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13

（一）国外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13

（二）国内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25

四、新经济创新试验区的发展思路 33

（一）总体思路 33

（二）发展定位 33

（三）发展目标 34

五、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发展的策略路径 35

（一）制度引领 35

（二）平台支撑 35

（三）应用示范 36

（四）生态赋能 36

六、政策建议 38

（一）建立示范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 38

（二）完善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39

（三）加大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金融支持 40

（四）构建新经济多元化城市应用场景 41

（五）优化“双创”平台赋能新经济发展 43

（六）完善应对新经济风险的体制机制 44

（七）建立新经济发展统计与测度标准 45

附件：深圳创建新经济试验区行动方案（2021-2025） 46

前言

“新经济”一词最早源自美国《商业周刊》，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基本特点是“一高三低”， 即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低赤字率。新经济代表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已成为当前许多国家、地区、城市发展经济的核心任务。2014 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四新”经济概念，即“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2016 年 4 月，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专项统计报表制度》，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的角度，对新经济进行统计。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决定》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工程，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打造新经济策源地。课题紧密结合深圳新经济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深圳发展新经济面临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借鉴国内外新经济创新发展成熟经验，明确深圳创建新经济试验区的战略思路，明晰发展定位和目标，从制度、平台、生态、应用等角度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助推深圳新经济迈向新高度、实现新跨越，成为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相结合的枢纽城市。

一、深圳新经济发展现状与环境

（一）发展现状

1.新经济主引擎作用愈加明显

深圳新经济发展成绩喜人，形成了经济增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等“三个为主”的产业结构。2019 年深圳新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2/3，高新技术、金融服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合计 17487.35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64.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10155.51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 5086.15 亿元，同比增长 6.6%，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 1596.59 亿元，同比增长 18.0%。规模以上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2019 年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71.9%。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 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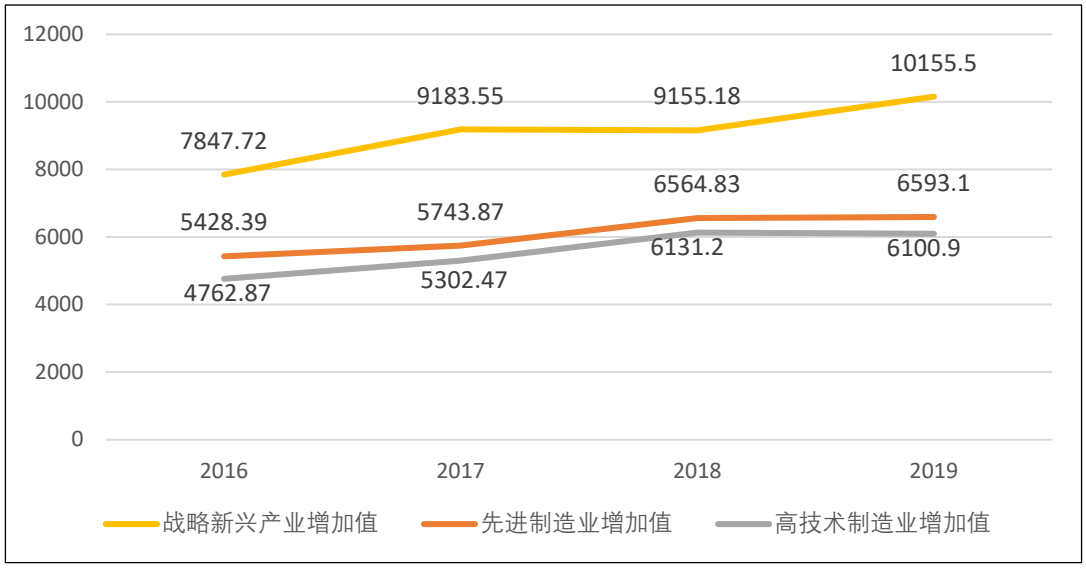

图 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16-2019 年深圳市统计公报。

2.新经济引领能力明显提高

深圳新兴产业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转向“并跑”“领跑”，在5G、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深圳20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覆盖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历年来最好成绩。龙头骨干企业坚持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在5G标准制定、频谱研究、技术创新、产品验证等方面率先布局，华为、中兴等厂商推动极化码、大规模天线新型多址技术、车联网等被5G国际标准采纳。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超过200家，包括大疆科技、优必选、碳云智能等业界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已逐步形成了覆盖设计、开发、制造、服务等环节的全链条人工智能产业系统，在深度学习、语音识别等技术领域实力突出。集成电路设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7、2018年华为海思连续在设计领域全球排名第五（见图1-2），成功开发了200多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申请了8000多项专利。

2018 Rank	Company	2017 (USD M)	2018 (USD M)	YoY (%)
1	Broadcom	18,824	21,754	15.6
2	Qualcomm	17,212	16,450	-4.4
3	Nvidia	9,714	11,716	20.6
4	MediaTek	7,826	7,894	0.9
5	Hisilicon	5,645	7,573	34.2
6	AMD	5,329	6,475	21.5
7	Marvell	2,409	2,931	21.7
8	Xilinx	2,476	2,904	17.3
9	Novatek	1,547	1,818	17.6
10	Realtek	1,370	1,519	10.9
Top 10 Total		72,351	81,034	12.0

图1-2 2018年前十大IC设计公司

数据来源：DIGITIMES Research。

3. 新经济创新载体质量大幅提升

深圳持续强优势、补短板，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招商，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水平，推动新经济创新发展。2019 年深圳举行全球招商大会，现场签约项目 128 个，总投资超过 5600 亿元。世界航空航天巨头空中客车启用中国创新中心，世界领先的商业战略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建立亚太数字化中心，埃森哲全球创新研发中心正式启动。百度国际总部、阿里巴巴国际运营总部、小米国际总部等国内巨头也相继落户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方阵进一步扩容，2019 年深圳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700 多家，总量超过 1.7 万家，仅次于北京。光明科学城规划建设全面提速，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等大科学装置加快建设，深圳湾实验室等高端创新资源落户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上升为部省市共建平台，初步形成高水平实验室集群，其中鹏城实验室成立短短一年多时间就集聚了 22 位院士、1600 多名科研人员，承担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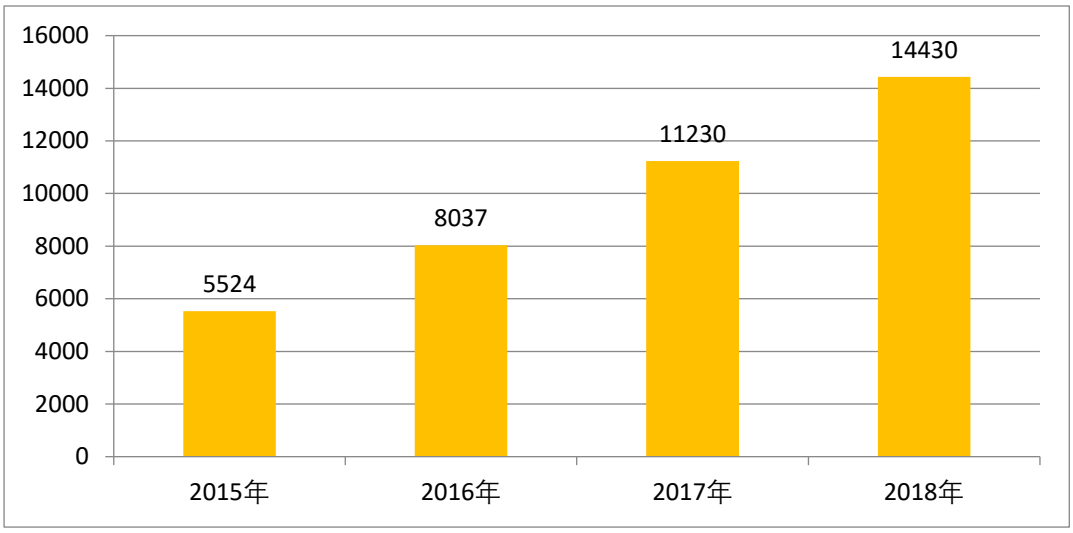

图 1-3 深圳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天眼查。

4. 新经济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深圳强化基础研究并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不断完善。政府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坚持将 30%的市本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继续保持全国领先，自 2018 年以来，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 1000 亿元/年。知识产权创造数量及质量均取得突破，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五项核心指标居全国第一，其中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03 件，为全国平均水平（13.3 件）的 8 倍。获批建设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 4 家省级实验室、13 个基础研究机构和 9 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累计获得资助的孵化器共 130 家、创客空间 236 家、创客服务平台 98 家，资助金额逾 6.5 亿元。新经济市场主体发展更具韧性和活力，2020 年 1-6 月，深圳市共新登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7234 户，同比上涨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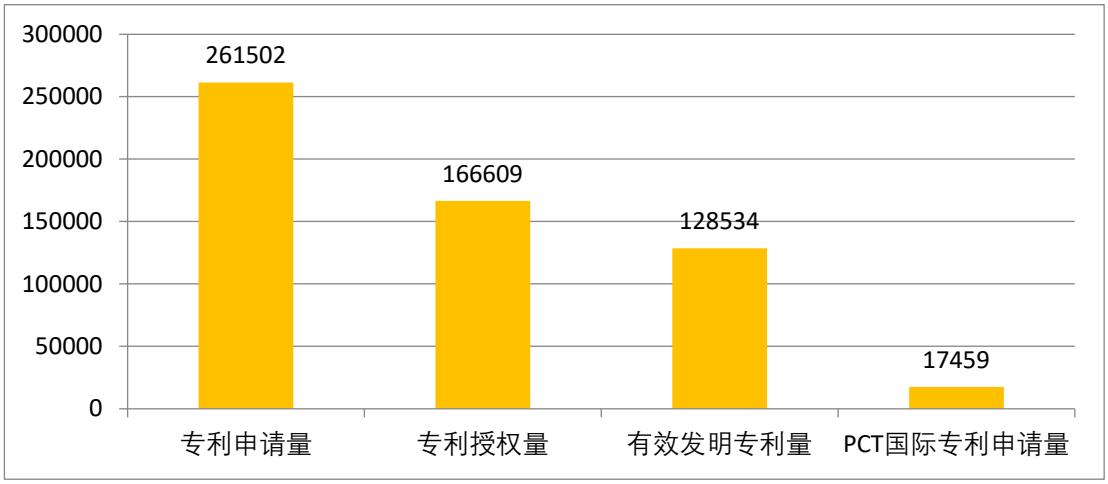

图 1-4 2019 年深圳市专利数据

数据来源：《深圳市 2019 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

5.新经济营商环境改善力度日益加大

全面优化的营商环境、服务效能，助力深圳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深圳对营商环境改革的要求高且不断加强法制化的保障，《深圳市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行动方案》中，诸多改革事项与目标要求已超过世行指标体系。深圳在《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综合评价排名中位列第三。2020 年《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的出台，将为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供法制保障。深圳支持企业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支持企业为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性技术问题实施技术攻关，支持企业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支持孵化器建设，为初创型小微科技企业提供创业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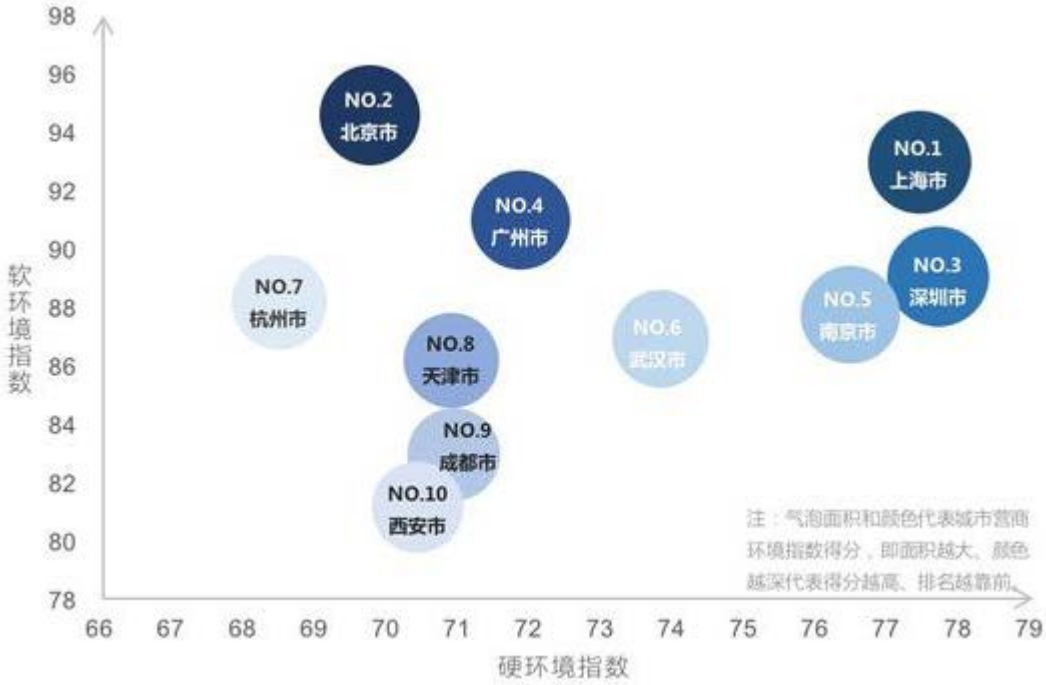

图 1-5 2019 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 top10
数据来源：《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

（二）存在问题

1.新经济监管方式创新不足

面对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四新”为标志的新经济，沿用传统监管思维常常力不从心。目前，我市新经济监管碎片化、监管滞后、监管缺失并存，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府工作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监管中还存在着明显的部门协调不够、上下联动不够等问题。现行政府监管体系滞后，如一些新型企业可能面临着难以归类问题，政府对这些新型企业业务流程、业务形态相对陌生，较难准确识别其风险点和加强监管，易造成政府过度或过宽监管新经济，出错可能性大大增加。政府监管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上也明显不足，监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行业监管滞后于新兴行业发展，商事登记找不到对应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和共管部门较为模糊,监管就难以到位。

2.新经济行业标准认证断层

新经济发展升级过程中，大量新兴行业及产品涌现，对应的标准处于真空状态，不仅国家标准尚未出台，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也欠缺。目前，在深圳企业引领下，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出现了一系列传统监测手段和认证方式无法进行认证的新型产品和服务，对认证产业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新要求。云轨技术、干细胞治疗、太赫兹、基因检测、无人机等新技术领域，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相关标准的制定、调整跟不上新技术新产品发展需要，新技术新产品

的市场准入机制相对滞后，对新技术新产品走向国际市场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认证机构主观能动性差、经验积累欠缺、客观能力不足、技术投入不足等因素，目前，深圳认证产业能满足中高端质量需求的服务项目仍然较少，创新动力不足、自身能力不够，认证机构高端认证开发滞后，一些高端认证起步较晚，与市场需求、国外机构的差距还比较大。

3.新经济关键领域人才短缺

人才是新经济创新的第一资源，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以及数字经济素养的高水平人才。随着新经济蓬勃发展，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人才需求旺盛，并催生了一大批高薪新职业。目前，各地新经济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而深圳对新经济人才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面临数据分析师、数据构架师、金融科技、知识产权等新经济领域专业性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优兴咨询（Universum）公布“2020年中国学生心中最具吸引力雇主Top20”中国区数据，阿里巴巴超越华为，被评为中国商科和文科学生心中最具吸引力雇主的第一名，并在五大学科领域榜单上均位列前三名，腾讯排名第五，百度、谷歌、京东分列9、10、12。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发布“顶尖公司排行榜”，有25家上榜中外公司被评为中国职场人最向往的企业，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占比高达70%，其中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复星和蔚来位居榜单前五，无一家深圳

公司。

4.新经济的伦理道德框架建设滞后

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任何具有变革性的新技术或新产业都必然带来法律的、伦理的以及社会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等领域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并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及社会规范的研讨和制定。在人工智能领域，IEEE 全球人工智能与伦理倡议、阿西洛马人工智能 23 条伦理原则，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专门提出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的三步走规划。深圳新技术变革明显快于伦理研究，面对新产业下科技发展的现代科技伦理问题，新技术新产业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日益凸显。2018 年“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论，对深圳乃至我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带来不小的冲击。

（三）发展机遇

1.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催动新经济快速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老长周期交汇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逐渐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蓬勃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及其与生物、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群体突破，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批颠覆性技术将引领和带动新科技产业革命逐渐走向高潮。信息技术、智能化

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组织网络化、产业集群虚拟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加快发展，制造企业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从产品制造向服务端延伸、整合，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入融合。

2. 央地政策持续加码完善新经济发展环境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新经济的概念在国内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15 年中央明确提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大众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市场、打造新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2016 年全国“两会”上，“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中央及各部委出台相应鼓励和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也纷纷配套支持和发展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新技术和大批新市场出现，催生了新商业、新业态、新产业，新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了良好示范效应，吸引社会资源向新经济聚集，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

3. “双区建设”为深圳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9 年，中央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改革开放标兵的深圳，被赋予了新的定位和使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为深圳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要求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先行示范区意见》为深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高地的战略定位，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深圳需紧抓“双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突破关键领域前沿技术、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提供政策支撑。

二、深圳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的意义

（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先行示范区意见”)要求深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未来产业。伴随新动能的发展壮大、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迅速崛起，分享经济、粉丝经济、个性经济等均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产业架构重构，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和资金链，助推经济驶入新发展阶段。目前，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电子商务、零接触金融、直播经济等非接触经济的新业态正快速发展。深圳借助在 5G、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催生新产业，可以推动深圳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

和发展。

（二）打破高质量发展制度藩篱的重要契机

新经济新技术的突破将倒逼新的制度供给，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将优化甚至代替原来的制度环境，从而引发区域性的制度创新，填补原来的制度空白。新经济将推动政府探索高效运行的政产学研用的组织方式，以便于在引导要素流动、平台设立、政策设计等方面更好地满足新经济、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先行示范区意见》中支持深圳开展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深圳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为率先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治理规则提供了契机，在促进新产业的发展，给企业留足成长空间的同时维持市场稳定。通过监管“松绑”，让市场在配置要素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新经济迸发活力，推动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战略的重要举措

新技术的突破需要重点研究院所、高校和行业龙头技术等创新主体加大科研投入，组织大量各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参与。同时也要为新技术的产业化提供制度环境，让创新主体的投入有较高的回报。深圳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将创新作为新经济发展理念之首，摆在核心位置，通过制度创新，为新技术产业化扫除规则、标准、认证体系等方面的障碍，有利于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同时，为新经济提供人才、资金、创新链条衔接等资源和服务，在更大范围内动员创新资源参与突破创新，实现高效配置，较快推动新技

术成果的应用转化。最终，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经济发展中落实。

（四）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驱动要素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已经从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向以数据、信息和知识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形态演进。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无限供给、迭代加速、复用价值高的特点，带来极高的边际价值，延展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成为推动产业价值链高端跃升、行业和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的驱动力量。以新型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新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深圳创建新经济创新试验区，探索新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为新经济发展破除要素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深圳经济实现可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内外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一）国外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1.建立新经济发展的测度标准

欧美率先制定有关新经济发展的测度标准。欧盟对新经济统计贡献颇丰的机构是欧盟新经济统计信息系统（NESIS）。该机构构建的新经济统计框架由 ICT 与全球化、创新、特征与表现、宏观经济、能力和策略、扶持政策与设施六大模块构成，强调新经济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 ICT 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基于 NESIS 新经济统计框架，

NESIS 提出了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见表 3-1）。

表 3-1 欧盟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ICT 与全球化	基于购买力平价水平的人均GDP、商业部门的服务增加值、ICT 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雇工人均劳动生产率、贸易对GDP的比率、ICT 产品的出口、外资制造业、外资服务业
创新	企业研发支出、专利申请、ICT 专利、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创新企业、改变组织结构的企业、创新产品带来的交易额
特征与表现	ICT 支出、创新在市场占有率中的作用、网络域名数、互联网使用的费用、电子商务及企业中的电子销售、创业企业、风险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商业部门服务增加值、ICT 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雇佣人人均劳动生产率、总雇佣率、通货膨胀率、公共平衡、经济能源密集度、温室气体排放、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总长期失业率
能力和策略	企业中的研发人员、创新合作、企业互联网使用、企业宽带使用；住户互联网使用、个人互联网使用、住户宽带使用
扶持政策与设施	科技人力资源、高中毕业率、公共部门研发人员、人均拥有手机数量、博士毕业率、科学与工程博士；私营企业创新活动的公共资金、政府资助的研发支出、在线政府服务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作为研究新经济的专门机构及高端智库，分别在 1999、2002、2007、2008、2010、2012 和 2014 年发布了七次《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报告》（The State New Economic Index）。该报告使用知识型就业、全球化、经济活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等 5 大类共 25 个指标（共 18 分）（见表 3-2）对美国 50 个州的“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定量测度，研究了新经济发展过程及评价指标、不同区域新经济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是研究“新经济”定量评价的重要参考资料。在美

国新经济指数中，将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新经济”发展的源泉，知识型就业、创新能力所占比重最大。

表 3-2 美国新经济指数

指标	分类指标
知识型就业（5 分）	信息技术行业就业，管理、专业、技术就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知识工作者的移民，美国知识工作者的移民，制造业附加值，高薪贸易服务
全球化（2 分）	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
经济活力（3.5 分）	就业不稳定性，快速成长的公司，公司 IPO，创业活动，发明专利
数字经济（2.5 分）	电子政务，在线农业，宽带通信，健康 IT
创新能力（5 分）	高科技就业，专家和工程师，专利，企业 RD 投入，非企业 RD 投入，绿色能源经济，风险投资

资料来源：《2014 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报告》。

2. 建立健全金融创新体系

美国从国家、企业、个人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以及及时有效地创新和改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新经济企业得以快速成长，推动美国经济持续繁荣。

首先，风险资本是推动美国“新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动力。科技成果的孵化、成长和产业化过程具有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特点，因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的发展是互为前提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风险投资最成功、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风险投资资本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其第二板市场完善畅通，特别是纳斯达克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循环渠道。

美国新经济时期针对风险企业的金融创新也开始逐渐增多。中小科技企业在发展初期规模较小，但却需要大量

的资金支撑其研发运转，因此需要有相关风险投资机制支撑中小企业创业。目前美国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已经从税收优惠和政府贷款转向为中小企业的债券提供担保，从而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便利。美国还存在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只要经评估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都能获得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基金通过给中小企业融资孵化优秀企业，同时又在优秀企业发展壮大中获得收益，用以孵化更多企业，形成一种双赢的良性互动。在美国大约有 90%的科技型企业是按照风险资本的运作模式发展起来的，如英特尔、戴尔、微软以及后来的苹果等高技术产业的领头羊，都是风险资本成功运作的典范。

此外，美国在新经济时期使其贸易逆差扩大，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断地印发纸币用于支付逆差额，而其他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美元回流美国，一方面降低了美国企业的融资难度，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美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润率。美国利用贸易逆差大量吞进亚洲的廉价资产。美国还设立了 ERISA 养老金立法等法案，支持投资者利用储蓄进行市场投资，保持资本市场繁荣。

3.推动全球化并参与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

美国作为数字发展领域的佼佼者，深谙率先进入市场、订立规则的必要性。为制定符合美国发展方向、利于全球数字市场开放的国际及区域性规制，美国一直对促进相关谈判达成、构建系统贸易规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须

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制定合理的对外经济政策，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最优发展。

美国政府为帮助新经济企业发展，把开拓国外市场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地位，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大调整：第一，对外贸易由多年实行的“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调整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第二，对外贸易从控制进口调整为扩大出口，大力推动出口战略。第三，把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第四，积极推动现有的多边、双边或国际性贸易协议，全面降低关税（2016 年后开始有所调整）。内外相结合的宏观政策给美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经济发展之初，出于开拓市场、赚取利润的目的，美国通过各种国际性论坛、组织声明立场，反对任何为数字经济发展制造壁垒的行为。在服务贸易层面，美国联合欧盟、澳大利亚等占 70%国际服务贸易额的“服务业内的真朋友（RGF）”开启次多边级别的区域谈判，即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致力于推动电子商务、金融、电信、专业服务人员的跨境流动等方面的市场开放和准则提升。

除多边及次多边协定外，美国选择借助双边模式这一跳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情形出现的同时，可更为轻松跨过贸易障碍线，同利益牵扯方开展双边谈判，为数字时代的经济发展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规则框架。凭借双边 FTA 谈判阻力较小的特点，美国逐渐完善了符合

其利益追求的规制框架的构建。虽然法律的定制总体上仍落后于实践，但从《美智 FTA》起，到《美澳 FTA》、《美韩 FTA》，再到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2016年暂停）和 TISA 的推动，美国编织了一张从中东到南美，从亚太到大西洋，遍及全球且囊括货物及服务的数字贸易大网。在“大网”的笼罩下，美国实现了共享全球繁荣成果、重塑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设想。

4.宽松的“双创”环境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

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新经济增长的源泉。各国在数字经济涉及的部门均有较大投入。在 OECD 国家中，用于数字经济相关创新的商业研发投入，占所有商业研发投入的 33%，在很多国家都超过本国 GDP 的 0.5%。韩国（1.75%）、以色列（1.5%）和芬兰（1.2%），位列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的前三位，美国、日本和瑞典紧随其后（都高于 0.6%）。

经济的竞争就是科技竞争。美国把保持技术领先作为一贯国策，重视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在科技创新中，2000 年美国公司的应用开发投资占总投资的 75%，用于研究开发的投资达到 1900 亿美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十分重视对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投入。巨额的研发投入，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成为美国科技占据全球优势的强大的资金保障。美国研发经费除政府预算外，还来源于 R&D 企业的自身融资，外界的风险投资、高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据美国白宫预算管理

部门的数据显示，2013 年政府之于科研的预算达 1303 亿美元，且这一数据仍在不断攀升中，至 2016 年预算同比增长 7.8%，为四年来的峰值，总额达到 1460 亿美元。现在，美国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七国集团”中另外六国的总支出还高，美国在经合组织研发总经费中所占的份额也高达约 40%。巨额的研发投入，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成为美国科技占据全球优势的强大的资金保障，同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技术是打开某一领域大门的钥匙，也是进入该领域后能否一枝独秀的关键。美国政府及企业利用其先发优势(GPS 于 1964 年投入使用、Intel 于 1968 年成立、Microsoft 于 1975 年成立）将产品、技术标准对外输出到全球各地，于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垄断市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仍在使用 GPS 定位、使用 Intel 的芯片处理日常事务、在电脑上安装 Microsoft 的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全球的消费者已习惯使用这些产品并对其蕴含的技术赋予极大的信赖，美国政府及企业先行建立起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及市场，将后来人挡在门外。

企业在 ICT 技术上的研究与开发（R&D)，带来了云存储等的出现；愈加便宜的终端设备使得个人接触数字经济的成本降低、可能性上升；从 1996 年单纯联合的 Wed1.0 发展到 2016 年互动同步的 Wed3.0 等，这些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创新要素及技术，为美国数字经济的进步与强大提供了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目前，美国已发展成为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相较于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或不变资本，知识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而对外的技术依存度低于 5%的状态。先行确立的技术优势、后续庞大的 R&D 投入、科技自身变革及发展环境的转变，重重保障造就了美国今天的技术优势。

5.推动信息产业和智慧产业发展

信息产业和智慧产业具有很高的渗透性，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成本，使企业、厂商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更加有效率，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由于互联网信息传输的便利性，它与其他各产业的关联度不断提高，信息产品不断增加，信息产业规模急速膨胀，以信息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从而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2000 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8500 亿美元，占 GDP 的 11%，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贡献率为 38%，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达 135 万个，接近汽车工业提供的 150 万个就业机会。美国传统产业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生产、管理、销售各个环节，使产品更新加快，成本下降，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十年前，美国的信息技术产品基本上控制了世界市场，2012 年，美国中央处理器（CPU）芯片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90%，应用软件占 50%。美国信息产业已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高新技术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进了企业的管理，提高了管理效

率，并且使传统产业相对过剩的状况大大缓解，特别是利用计算机管理，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增长势头得以维持。

信息产业的发展是新经济产生的源头，信息产业的包容性强，能够联系和带动其他各行业的发展。在硬件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美国在信息产业方面领先全球；美国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列出专款用于信息技术研究，以推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

在软件方面，互联网企业迅速增加，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重新配置各种资源，降低了商务成本，加速了物流和资金流的周转速度，产品生产周期急剧缩短。人们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教育、医疗、餐饮等方面的服务，为社会创造了旺盛的消费需求。信息产业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接收了大量就业人口，而电子商务又使得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弱化，商品价格下降。可以说，信息产业的发展是美国新经济在世纪初一度出现“高增长、低物价、低失业率”的“一高两低”特征的重要原因。

6. 制定完善的政策及战略规划

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特色鲜明。发达国家为发展数字经济，不仅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还通过建立数字经济的战略规划，并对涉及的重点方向进行扶持。例如，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均推出了各自的战略计划。

数字英国战略。2017 年、2019 年英国分别颁布了《数字英国战略》《数字英国》，把数字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重塑国家竞争力的举措。重点关注 7 个领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公民数字技能、数字业务发展环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线生活和在线工作地方的安全性、政府在线服务质量、数据经济和公众信心。同时，2010 年，英国颁布实施《数字经济 2010 年法案》，旨在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对数字经济中利益相关方的权利进行保护，促进以音乐、游戏、媒体为主的文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高效发展。该做法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加强政府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和管理，将互联网纳入日常事务管理；二是加强对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著作权的保护力度，打击网络盗版，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三是对文创产品收费进行详细规定，促进文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战略。日本立足信息通信产业优势，重点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以支持科学技术创新为重点，先后出台《e-Japan》《u-Japan》《i-Japan》《ICT 成长战略》《智能日本 ICT 战略》《集成创新战略》和《综合创新战略》等战略，从智能制造、数字化人才培养等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日本将“超智能社会”定义为：一个充满活力、适宜生活的社会，能够将所需物品、服务在所需之时按所需之量提供给所需之人，精细化、精准化地应对社会各种需求，跨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等障碍，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服务。日本分别在《科学技术创

新综合战略 2016》《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7》《综合创新战略》中提出超智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

美国智慧城市战略。美国聚焦前沿技术重点突破，把握制造业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革命、激发传统工业的新活力。2008 年 IBM 公司首先提出“智慧地球”概念；随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智慧城市注重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新形态，既强调技术应用，更强调是对社会形态创新的一种方法论。以此，美国制定了以数据开放、大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三阶段国家发展战略。2016 年以来先后出台《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智能制造振兴计划》等，从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新加坡智慧国家战略。新加坡启动《智慧国家 2015》《智慧国家 2025》计划，以期达到连接、收集和理解。其中，“连接”是提供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信基础设施；“收集”是指通过遍布全国的传感器网络获取更理想的实时数据，并对数据采取匿名化保护、管理以及适当分享；“理解”是通过收集来的实时数据，建立面向公众的有效共享机制，并对数据分析，以更好地预测民众的需求和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

数字德国战略。德国以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先后出台《数字德国（2015）》《数字议程（2014-

2017)》《数字化战略（2025)》和《高技术战略2025》等政策，不断升级高技术战略，积极践行“工业4.0”，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7.重视数字技术利用模式创新

美、欧、日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重视数字技术利用的模式创新，各自结合本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渐渐形成了本国特色的数字技术利用模式。

市场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主，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扶持经济社会重大领域的大数据技术研发和人工智能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智慧化建设。美国注重技术先导下的“以点带面”数字技术利用方式，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

政府主导模式：以新加坡为主，以智慧国家建设为宗旨，以服务公民需求为重点，实行以政府为整体推动主体，与公民和企业深度合作，涉及智慧民生、智慧政府、智慧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诸方面。新加坡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 建设数字服务型合作政府。

兼有政府和市场的模式：以英国和日本为主，在政府引导下，引入市场和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参与智慧社会建设，政府将前瞻性的理念融入顶层设计中，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资金扶持等方面的基础保障作用，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在促进经济、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及智慧化的主体作用，实现合作共赢。例如，英

国鼓励第三方力量参与数字政府战略，通过改进招标过程，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吸引供应商加入到数字市场。日本高度重视公私合作关系，通过采纳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科技发展，在各个领域采用公私合作的融资模式。因此，上述属于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公私合作模式。

综合而言，在数字技术利用早期阶段，应重视日本和英国的公私合作模式，对智慧城市框架政府整体进行设计和推进，实施过程中同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深度合作，发挥数字经济的产业带动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后，应转向美国市场化模式，以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数字研发技术为突破口，带领整个城市智慧化建设和产业数字化变革，实现智慧产业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

（二）国内新经济创新发展经验

1. 推动新经济发展的浙江经验

（1）力推传统企业数字化发展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是创新经济和人才经济，只有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才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浙江的实践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也是新型创业人才、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的过程。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浙江多数企业感受到了转型的压力，处于“转型怕死、不转型等死”的两难境地。面对这一态势，浙江一方面通过打造平台积极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了“海归系、浙大系、 阿里系、浙商系”为代表的创新

创业“新四军”，同步推进“精英创业”和大众创业。另一方面，通过持续推进“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和市场主体升级等方式，增强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积极布局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摩院等一批重量级、高等级的新型科研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联合科研院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并在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中全面推开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平台，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为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推出这些服务的目的，在于让传统企业能够练好内功，适应新经济，成为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主体。

（2）发挥先行地区的数字化带动作用

传统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点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质。对于数字技术而言，传统产业是应用重要领域；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作为传统产业大省，浙江一直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仍没有完全破题。在面对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自身数字化能力不足以及数字化技术应用成本过高等问题时，传统企业的畏难情绪仍然十分明显。而从区域层面来看，由于传统产业数字化程度的分化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分化。杭州和宁波两地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而其他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数字化推进缓慢的区域则经济增长乏力，形成了区域

间的“数字鸿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在浙江的实施，也是为在全省范围内推进生产力的再优化，一方面发挥杭州、宁波等地在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的优势，进一步赋能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也是激励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推进形成全省层面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3）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先导力量。只有理解数字技术的价值、把握数字技术应用规律才能形成有效治理机制。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浙江把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再创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为个体、企业提供便捷与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模式和手段，着力以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低的制度性成本进一步营造规范公开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是坚持把保护创新、促进发展作为立法导向，因地制宜调整监管策略，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二是客观评价和准确判断各领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新业务、新业态的发展留有空间，适应数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变化快、业态新、规模小等特点，在技术创新与风险应对、网络开放与安全保障、数据挖掘与隐私保护、数据垄断与有序竞争之间寻求平衡；三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充分贯彻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消费者和小企业都能从中获益；四是规范数字消费环境，加快完善数字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良好氛围。

2.力求塑造新经济发展最好环境的成都经验

发展新经济，是成都贯彻中央要求，推动城市战略转型、经济变道超车、重塑竞争优势的重大抉择。作为全国第一个成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城市，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成都“变道超车”的重要抓手之一。自 2017 年起，成都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旗帜鲜明地提出打造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经过三年的实践，成都市新经济发展成绩突出。截至 2019 年底，成都市共有新经济企业达 36.6 万户，其中 6 家达到独角兽标准，122 家达到准独角兽标准；新经济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总额 193.6 亿元，成都市新经济活力指数全国第三，新职业人群规模全国第三，为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注入了强有力的新动能。

（1）强化新经济制度供给

政府持续完善“1+6+7+N”新经济政策框架。强化“六大形态”“七大应用场景” 的细分专业化发展，聚焦新经济人才、技术、资本、数据核心要素，出台电商 12 条、包容普惠创新、大数据产业和人才等政策措施。

（2）扶持智能经济企业发展

成都拥有坚实的智能经济产业基础和一批快速崛起的智能经济企业。云计算领域，成都聚集了中国西部信息中心、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腾讯西部大数据中心、万国数据、四川浪潮等为代表的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及云服务提供商 56 家，已形成规模化服务能力；大数据领域，超过 30%的成都新经济企业在产品和服务中采用了大数据技术，涉及 50 余个垂直细分行业，形成了众多创新型产品；物联网领域，集聚物联网企业和研发机构 400 余家，形成了以成都高新区为物联网产业高端研发区、双流区为物联网制造产业区的发展格局；人工智能领域，超过 10%的成都新经济企业研发或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涉及自然语言识别、语义分析、图像识别等基础领域，以及家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无人机、医疗健康、智能家居等行业。

3. 数字经济发展的上海标杆

（1）数字经济要素储备丰富

上海数字经济企业、人才、数据储备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商贸、港口、航运、物流、海关、商检、医疗、金融、通信等数据应用企业较多，网民普及率全国领先，网络购物用户等指标居全国前列，智慧社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数字领域积累了海量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就数据储备而言，当前上海三大基础数据库已汇聚 160 万法人单位、2500 万常住人口和全市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形成了网上政务大厅等跨部门数据平台；通过政府数据服务网累计向社会开放数据资源 1200 多项。2018 年 5 月，上海大数

据中心正式入驻市北高新园区，全面启动建设“数据神经元系统”，建成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

（2）着力强化数字化运营人才吸引力

上海是国内拥有数字人才最多的城市。上海在 ICT 基础产业方面不占人才优势，但逐步在 ICT 融合产业方面建立起强大的优势，在消费品、企业服务、教育、金融、医疗、娱乐和交通行业积累了较大的人才优势。上海在数字化运营职能方面的人才比例为约 8%，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在国内五大数字化“引领型”城市中，2014-2016 年上海数字人才净流入最多，甚至从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吸引了大量人才。

（3）抓住机遇持续投入夯实基础

“十一五”期间，上海信息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十二五”期间，信息产业集聚深化、形成产业特色基地。“十三五”期间，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8 年，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6450 亿元，同比增长 1.9%，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8.5%，新一代信息技术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062 亿元，增长 5.5%，高出电子信息制造业 3.6 个百分点，结构调整显示成效；在华力、和辉、中芯、积塔等重大项目带动下，电子信息制造业投资增幅明显，有力带动工业投资。

（4）推动数字化赋能所有产业

近年来，上海在数字产业指数方面增幅超过50%。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以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为主体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明显，正逐步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在制造业企业的应用率均超过30%。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在医疗服务、教育、娱乐、餐饮住宿、交通物流、金融、零售、旅游等服务业数字化领域均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5）力推5G基础建设布局未来

2018年，上海出台《上海市推进5G创新应用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围绕5G应用示范，营造世界一流的应用基础环境，建设培育一批影响面广、效果明显的示范基地和重点项目，以点带面促进5G与上海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将上海建设成为5G创新应用示范区和产业集聚高地。到2021年，实现上海5G应用“十百千”目标，即：重点建设10个创新应用示范基地（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枢纽、金融服务、智慧教育、文创体育、智慧旅游、城市治理、智慧生活），培育打造10家原创型5G创新应用企业，聚焦10个重点领域形成100个标杆应用项目，5G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6）不断丰富数字经济业态

上海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多。依托上海繁华的商业环境，除了数字经济在各个横向产业领域的运用，上海数字化应用也垂直渗透到各个商业环节。在研发环节数字化聚焦定制化开发、样品3D打印、数据模型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在生产环节推广传感器、无人机监测、生产数据分析等服务应用；在管理环节提升智慧供应链、仓储机器人、企业级资源管理等服务能力；在市场销售环节开展智慧定价、社交式消费场景、客户自助服务等模式创新；在分销售后环节探索远程监控、无人机送达等服务模式，以降低行业内部开发、运营和维护成本。

4.弯道超车发展新经济的贵州经验

贵州立足资源禀赋，着力发展能够发挥生态环境优势的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成为引领和支撑贵州后发赶超的大引擎。从 2014 年初贵州大数据元年的提出，到 2015 年 8 月，成为唯一出现在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的省份，贵州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共享经济、电子商务、呼叫中心等新兴服务业态在贵州的迅速崛起，显现出大数据发展的效应。

（1）抢抓新经济发展的先行机遇

在全国甚至全球大数据还处于探索发展期，贵州先声夺人，大胆尝试，获批建设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首家大数据交易所，率先颁布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发布实施全国首个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和大数据工程包等，用足用好用活了国家政策支持。作为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4 年位居全国首位，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 2 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

（2）利用数字技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抓住生态资源禀赋特点，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深入实施“千企改造·大数据助力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行动”，吸引高通、阿里巴巴、富士康、华为等大数据领军企业携大批人才和技术入驻，为贵州经济转型升级把脉会诊，帮助企业找病根开药方。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颠覆了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统思想，实现了一场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裂变。

四、新经济创新试验区的发展思路

（一）总体思路

以研发前沿颠覆性技术、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重构新经济发展架构为路径，以基础研究、源头创新为抓手，以打造科技成果产业化快车道为重点，突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瓶颈，建立符合新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推动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我国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持续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探索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着力打造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创新标杆。

（二）发展定位

——新技术策源地。瞄准新兴产业前沿颠覆性技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深圳在新技术标准上的话语权，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技术。

——新产品集聚地。围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发挥深圳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集聚效应，重点

突破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争取诞生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新业态引领地。着力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社会组织变化、需求变动、价值链分解融合，引领新业态衍生发展，成为全球新业态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

——新模式创新地。聚焦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生产、流通和商业创新，形成引领全球新经济发展的颠覆性模式。

（三）发展目标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集聚支撑新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有利新经济创新发展的弹性灵活、审慎包容监管服务体系，建立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认定、认证、定价机制，建立完善新经济创新发展的风险防控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产业创新、市场应用“四位一体”的新经济创新发展模式，用更先进的制度设计、更好的政策措施、更优的营商环境，吸聚全球新经济创新资源，代表国家抢抓全球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科技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先机，打造世界新经济策源地。

到2022年，形成竞争力全国领先的新经济产业体系，部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跻身全球中高端，成为全国新经济发展高地。到2025年，形成位居国际前列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整体迈向全球中高端，成

为推动全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到2035年，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球领先，成为世界新经济策源地。

五、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发展的策略路径

以改革创新作为驱动新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新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先行先试，努力开展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深圳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跟随型发展向引领型发展跨越、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

（一）制度引领

——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为引导新经济的发展开展立法调研，以保护创新、促进新经济发展为立法导向，制定《新经济发展促进法》，法律在规范的同时也为新业务和新业态的发展预留空间，以适应数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变化快、业态新和规模小的特点。

——完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政策。首先要清理阻碍新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其次要构建动态包容的审慎监管制度，对新经济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一定宽限期。最后，在制度设计时贯彻普惠共享的理念，实现新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二）平台支撑

——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华为、腾讯等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打造产业互联网平台，引导平台企

业、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开放资源，鼓励以区、行业、园区为整体，共建数字化技术及解决方案社区，共同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支持建设共性技术开发平台。为开发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支持科研院所或高校与企业合作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领域和企业范围探索建立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孪生、5G、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方面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

（三）应用示范

——建设纳入政府数据的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政府主动向社会全面开放数据（法律明确不能开放的数据除外），将互联网数据与政务数据资源配合应用，探索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开展数据资产平台化运营，建设在产业互联、行业精细化、精准营销等方面的应用场景。

——培育新经济优势行业的应用场景。选择深圳市的优势产业，引导有实力的企业主动参与建设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对纳入国家级的应用典型案例、创新项目、优秀应用进行奖励，打造“互联网+”升级版。

（四）生态赋能

——建立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协同推进供应链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供应链化，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链，支持产业以数字供应链打造生态圈。鼓励传统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行业性平台企业、

金融机构等开展联合创新，共享技术、通用性资产、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中试平台等资源，探索培育传统行业服务型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与业务流程重塑、组织结构优化、商业模式变革有机结合，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

——拓展新经济发展的生态空间。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支持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疏通政策障碍和难点堵点。引导云服务拓展至生产制造领域和中小微企业。完善传统企业数字化的生态环境。

六、政策建议

（一）建立示范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

建立新技术监管制度体系。率先推动新经济发展领域地方立法，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面向未来科技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探索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制度，开展科技伦理工作规范、技术标准创新，率先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物样本库伦理规范等新科技新技术应用保护体系，探索建立监管规则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推进新科技新技术应用示范。争取国家支持，国内其他城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开展的先行先试政策自动适用于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离岸科技创新特区；按照现行规定需要审批准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允许深圳制定相关标准和准入审批制度规则，率先开展先行先试应用。探索建立技术法规运行机制，加强地方法规对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规范的引用，将国家强制性工作规范、技术标准纳入技术法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法规体系。

率先探索新产品标准的制定。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准入、标准、认证、定价机制，打破新技术新产品走向市场的壁垒，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创新质量标准管理方式，优化标准体系，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建立新领域研发认证“绿色通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入先进的认证标准和技术，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等合作，构建认证认可国际合作机制，构建覆盖各领域的深圳标准体系。

创新监管方式。制定新技术新产品监管“松绑”计划，适当放宽新经济领域的准入条件和企业设立门槛，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采取包容态度，给予其发展成长“观察期”，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守风险底线，提升监管技术手段。树立“共治”理念，建立针对新经济领域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机制。重点围绕互联网+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跨界产业制度创新试验，建设全国新经济制度创新高地。

（二）完善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深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新经济创新试验区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优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资源，围绕“新经济”领域的重大共性需求和重点行业需要，开展工业互联网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促进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完善政府对各种“新经济”创新中心建设用地、办公场所、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机制。积极培育“互联网+制造”示范，优化对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软件“铸魂”工程等领域示范企业的支持方式。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培育一批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发掘一批掌握新经济行业技术、市场、品牌等话语权的企业。

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平台。加快制定新技术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为合适的新技术新产品“加速放行”。建设国际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推动国内外技术在深圳市场转化。应用新技术建设和治理城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为数字技术打造城市管理的应用场景。推动科研工作者和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连接，激发新经济活力。最终，促使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价值都实现最大化。

加快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深圳要及时修订有关标准、认证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新技术新产品快速实现产业化市场化提供有力保障，在国家标准未出台前，深圳要为企业建立新技术新产品标准申请的“绿色通道”；鼓励构建深圳和企业标准体系，在某些前沿科技应用领域，在国家标准制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争取获得国家授权率先建立相关标准体系，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尽早进入市场，为制定国家标准探索经验。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行业协会制定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缩短科研产品应用周期；支持市内认证行业提升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市内认证行业的发展，引入先进的认证标准和技术，加强与 ISO 等国际认证机构的合作，支持市内认证机构加入国际技术认证组织，提高国内认证行业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打造科学、权威、一流的质量认证体系率先探索。

（三）加大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金融支持

推行普惠性新经济金融服务。在新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探索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以专项资金、金融扶持形式鼓励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虚拟数字化生产资料等服务，加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小微企业多次复用的形式，降低中小微企业运行成本。鼓励获得国家或深圳市政策支持的试点平台、服务机构、示范项目等，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定期限的减免费服务。

探索“数据贷”服务。鼓励试验区联合金融机构，探索根据云服务中数据使用量、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改造的投入，认定为可抵押资产和研发投入，对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鼓励探索税收减免和返还措施。

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探索完善产融信息对接工作机制，丰富重点企业和项目的融资信息对接目录，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金融机构建设产融合作平台，创新面向上下游企业的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上云”保险等金融服务，促进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互利共赢。总结宝安区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经验，并在试验区推广。

（四）构建新经济多元化城市应用场景

深圳要在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拥有技术优势的重点领域，面向全市征集、评选一批高质量的应用场景示范项目，带动相关产业加快发

展，并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充分感知、全面互联、充足算力的实践试验环境。

打造数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依托智能制造园区，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打造数个全业务流程智能化的示范性企业。扶持比亚迪等企业加强自动驾驶、车联网与智能座舱领域的研究，完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试点的支持力度，支持华为等企业牵头打造能够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决策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示范性项目。

建设具有示范引领性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强化“云、网、端、数”四位一体的政务云平台建设，打造智慧政务示范应用场景，将智慧国资国企项目进一步完善并打造成示范引领性平台；会聚社会力量，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打造安全便利的智慧生活示范小区；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领域着力打造几个示范引领型应用场景；整体性打造城市设施智慧化管理的应用场景。

支持引领未来消费的应用场景建设。支持企业建设无人便利店、无人货架、AR 沉浸式体验等线下场景和 VR 试衣间、直播间卖货、云逛街等线上场景；构建“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外综服平台”的贸易新模式，打造高端消费交易平台；搭建智慧商圈平台，让智慧商圈范围内的商家快速精准感知消费者需求并及时做出响应和服务。

（五）优化“双创”平台赋能新经济发展

加强高端创新平台的建设。突出“双区”驱动优势，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在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重大创新载体，在人工智能领域打造国家级先行示范平台，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组建新经济研发平台。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链接全球科技创要素，吸引国际知名研发机构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通过高端平台的建设，引进一批新经济创新人才。

打造多个创新平台集聚区。重点将福田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龙华九龙山、龙岗宝龙科技城、坂雪岗科技城、光明凤凰城等打造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新支点。在这些区域积极培育研发、检测、设计等服务性机构，构建包括信息服务、研发服务、展示交易、中介服务、人才培训、维权援助等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做强科技金融平台，做大政府产业基金，完善政银合作模式，做精产品研发贷、技术改造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投贷联动等科技金融服务。

大力推进创业平台的建设。以全市主要众创空间为载体，搭建新经济创业共享平台，构建专业资源、现场活动、数据服务、市场推广、金融资源、网络平台等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从创意到样品“0-1”的突破。鼓励华为、腾讯、大疆等行业龙头企业依托产业基础和存量空间，围

绕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方向，搭建开放式孵化加速平台。

（六）完善应对新经济风险的体制机制

着眼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政府机构、新经济企业、行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消费群体共同参与的规则协商、利益分配和权益内生保障新机制，形成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形成防范新经济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推动新经济相关行业发展时需要金融创新，可能诱发非法金融活动，针对这类金融风险，将加强大数据监管技术的应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新经济的发展，实现监管与风险防控的平衡。

形成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体制机制。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新经济主体容易面临商标抢注、专利诉讼、商业秘密被泄露等风险，为此，要建立商标注册预申报、专利侵权预警数据库等为新经济主体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改革措施。支持企业建立自己专利储备，扶持第三方机构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早期介入服务；支持企业对泄露商业机密的相关责任人提起诉讼。

建立防范突破伦理道德风险的机制。随着深圳的部分新技术进入“无人区”，这些技术给政府带来了监管上的挑战。在国家相关法律出台之前，在新经济创新试验区率先探索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基因剪辑）等新技术制定地方监管条例，采用定期召开社会各界专家组成的评价会议的形式对条例进行修订。

（七）建立新经济发展统计与测度标准

现有数字经济的测度体系并没有充分反映数字经济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数字经济对经济活动性质的改造。而有效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新经济的贡献进行统计与测度。在新经济创新试验区将尝试建立新经济发展的统计与测度标准。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测量标准。重点探索以下领域的统计与标准制定：ICT（信息技术）投资；数字经济的技能投入与产业；安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度量指标；数字经济对社会影响力的度量。

支持腾讯研究院“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的完善与推广。该指数包括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民生 4 个分指数，共涵盖 14 个一级指标、135 个二级指标，内容涉及社交、新闻、视频、云计算、三次产业的 17 个主要子行业、基于移动互联的创新创业、智慧民生等。

附件：深圳创建新经济试验区行动方案（2021-2025）

为抓住“双区驱动”的机遇，深入实施新经济战略，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优化和培育新经济生态，扎实推进深圳新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构建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研发前沿颠覆性技术、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重构新经济发展架构为路径，以基础研究、源头创新为抓手，以打造科技成果产业化快车道为重点，突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瓶颈，建立符合新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推动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我国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持续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探索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着力打造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创新标杆。

二、基本原则

——系统筹划、全面推进。系统推进政策、机制、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集聚市区、行业、企业等资源，有序扩大新经济发展平台供给，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充分发挥深圳科技和人才优势，加快推动产业链向高端环节延伸，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紧紧围绕智慧城市建设需求，促进基于数字化的示范城市发展。

——平台融合、生态赋能。利用深圳数字技术领先的优势，推动数字技术在经济各领域的全面应用，通过数字平台推动产业链内外融合、产供销融合，围绕平台打造应用场景，形成场景供给多元生态。加强新技术应用示范，推动创新资源聚合，带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创新制度、审慎监管。创新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加速技术、产品应用和迭代，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审慎监管新经济的发展，实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方推动、共同发展新经济的格局。

三、发展定位

——新技术策源地。瞄准新兴产业前沿颠覆性技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深圳在新技术标准上的话语权，产出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技术。

——新产品集聚地。围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发挥深圳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集聚效应，重点突破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争取诞生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新业态引领地。着力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社会组织变化、需求变动、价值链分解融合，引领新业态衍生发展，成为全球新业态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

——新模式创新地。聚焦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生产、流通和商业创新，形成引领全球新经济发展的颠覆性模式。

四、发展目标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集聚支撑新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有利新经济创新发展的弹性灵活、审慎包容监管服务体系，建立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认定、认证、定价机制，建立完善新经济创新发展的风险防控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产业创新、市场应用“四位一

体”的新经济创新发展模式，用更先进的制度设计、更好的政策措施、更优的营商环境，吸聚全球新经济创新资源，代表国家抢抓全球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科技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先机，打造世界级新经济策源地。

到 2022 年，形成竞争力全国领先的新经济产业体系，部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跻身全球中高端，成为全国新经济发展高地。到 2025 年，形成位居国际前列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整体迈向全球中高端，成为推动全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到 2035 年，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球领先，成为世界新经济策源地。

五、重点任务

（一）建立示范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

1. 建立新技术监管制度体系。率先推动新经济发展领域地方立法，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面向未来科技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探索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制度，开展科技伦理工作规范、技术标准创新，率先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物样本库伦理规范等新技术应用保护体系，探索建立监管规则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推进新技术应用示范。

按照现行规定需要审批准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制定相关深圳标准和准入审批制度规则，率先开展先行先试应用。

2. 率先探索新产品标准的制定。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准入、标准、认证、定价机制，打破新技术、新产品走向市场的壁垒，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创新质量标准管理方式，优化标准体系，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建立新领域研发认证“绿色通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入先进的认证标准和技术，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等合作，构建认证认可国际合作机制，构建覆盖各领域的深圳标准体系。

3. 创新监管方式。制定新技术新产品监管“松绑”计划，适当放宽新经济领域的准入条件和企业设立门槛，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采取包容态度，给予其发展成长“观察期”，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守风险底线。重点围绕互联网+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跨界产业制度创新试验，建设全国新经济制度创新高地。

（二）完善促进新技术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4. 优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资源，建立产业集群管理的实体组织，打造新型产业集群，围绕“新经济”领域的重大共性需求和重点行业需要，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加速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完善政府对各种“新经济”创新中心建设用地、办公场所、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机制。积极培育“互联网+制造”示范，优化对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软件“铸魂”工程等领域示范企业的支持方式。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培育一批掌握新经济行业技术、市场、品牌等全球话语权的企业，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组织。

5. 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平台。加快制定新技术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为合适的新技术新产品“加速放行”。建设国际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推动国内外技术在深圳市场转化。应用新技术建设和治理城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为数字技术打造城市管理的应用场景。推动科研工作者和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连接，激发新经济活力。

6. 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修订有关标准、认证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新技术新产品快速实现产业

化市场化提供有力保障，在国家标准未出台前，为企业建立新技术新产品标准申请的“绿色通道”；鼓励构建深圳和企业标准体系，在某些前沿科技应用领域，为制定国家标准探索经验。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行业协会制定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缩短科研产品应用周期；支持市内认证行业提升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加入国际技术认证组织，提高国内认证行业的国际话语权。

（三）加大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金融支持

7. 推行普惠性新经济金融服务。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以专项资金、金融扶持形式鼓励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虚拟数字化生产资料等服务，加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小微企业多次复用的形式，降低中小微企业运行成本。鼓励获得国家或深圳市政策支持的试点平台、服务机构、示范项目等，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定期限的减免费服务。

8. 鼓励金融机构推出“数据贷”服务。鼓励市内金融机构，探索根据云服务中数据使用量、智能化设备和数字

化改造的投入，认定为可抵押资产和研发投入，对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通过金融工具帮助传统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

9. 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推广宝安区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经验，完善产融信息对接工作机制，丰富重点企业和项目的融资信息对接目录，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金融机构建设产融合作平台，创新面向上下游企业的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上云”保险等金融服务，促进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互利共赢。

（四）构建多元化新经济应用场景

10. 打造N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依托智能制造园区，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打造N个全业务流程智能化的示范性企业。扶持比亚迪等企业加强自动驾驶、车联网与智能座舱领域的研究，完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试点的支持力度，支持华为等企业牵头打造能够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决策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示范性项目。

11. 建设具有示范引领性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强化

“云、网、端、数”四位一体的政务云平台建设，打造智慧政务示范应用场景，将智慧国资国企项目进一步完善并打造成示范引领性平台；会聚社会力量，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打造安全便利的智慧生活示范小区；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领域着力打造几个示范引领型应用场景；整体性打造城市设施智慧化管理的应用场景。

12. 支持符合未来消费习惯的应用场景建设。通过场景建设推动服务企业数字化提升，支持企业建设无人便利店、无人货架、AR 沉浸式体验等线下场景和 VR 试衣间、直播间卖货、云逛街等线上场景；构建“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外综服平台”的贸易新模式，打造高端消费交易平台；搭建智慧商圈平台，让智慧商圈范围内的商家快速精准感知消费者需求并及时做出响应和服务。

（五）优化“双创”平台赋能新经济发展

13. 加强高端创新平台的建设。突出“双区”驱动优势，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 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重大创新载体，在人工智能领域打造国家级先行示范平台，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支持行业

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组建新经济高端研发平台。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要素，吸引国际知名研发机构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通过高端平台的建设，引进一批新经济创新人才。

14. 打造多个创新平台集聚区。重点将福田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龙华九龙山、龙岗宝龙科技城、坂雪岗科技城、西丽科教城、光明凤凰城等打造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新支点。在这些区域积极培育研发、检测、设计等服务性机构，构建包括信息服务、研发服务、展示交易、中介服务、人才培训、维权援助等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体系。

15. 大力推进创业平台的建设。以全市主要众创空间为载体，搭建新经济创业共享平台，构建专业资源、现场活动、数据服务、市场推广、金融资源、网络平台等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从创意到样品“0-1”的突破。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依托产业基础和存量空间，围绕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方向，搭建开放式孵化加速平台。

（六）完善应对新经济风险的体制机制

16. 形成防范新经济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着眼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政府机构、新经济企业、行业组织、从业

人员以及消费群体共同参与的规则协商、利益分配和权益内生保障新机制，形成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强大数据监管技术的应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新经济的发展，实现监管与风险防控的平衡。

17. 形成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体制机制。建立商标注册预申报、专利侵权预警数据库等为新经济主体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改革措施。支持企业建立专利储备，扶持第三方机构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早期介入专利服务；加大企业对泄露商业机密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支持力度。

18. 建立防范突破伦理道德风险的机制。加强进入“无人区”新技术企事业单位的监管。在国家相关法律出台之前，率先探索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基因剪辑）等新技术制定地方监管条例，定期向社会各界专家征求对条例修订的意见，引导新技术服务人类发展。

（七）建立新经济发展的统计与测度标准

19. 探索制定新经济的统计与标准。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测量标准。重点探索以下领域的统计与标准制定：ICT （信息技术）投资；数字经济的技能投入与产业；安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度量指标；数

字经济对社会影响力的度量。

20. 支持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的完善与推广。 结合新经济发展的新进展，优化该指数的相关指标，形成全球领先的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加大该指数在区域产业规划中的推广应用。率先将本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数据开放给指数编制单位——腾讯研究院，并积极协调向中央政府请示将全国的数据向本指数开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深圳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统筹推进全市新经济发展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担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市委改革办办公，办公室下设工作专班，并引进新经济专门人才。设立新经济专家委员会，吸收国际国内知名院士专家、知名企业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支撑。

（二）形成战略支撑

将引领性发展新经济作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列入全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全市各专项规划中均要增加新经济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各区、市直各部门均要

制订相应的新经济实施方案，并制定部门及区级支持政策。在深圳都市圈推动将新经济纳入长远规划中。

（三）加强跟踪评价

建立新经济工作推进跟踪考核体系，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及动态跟踪督查，将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各区和市直各单位年度绩效目标考核体系。联合腾讯研究院强化对各区新经济发展的日常统计、运行监测和综合评价。

（四）营造发展生态

对全市党政干部开展新经济知识培训，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懂新经济、抓新经济、用数字技术强化治理能力。实施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新经济融合应用培训，不断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实施全民数字教育计划，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鼓励社会主体举办各类新经济展会、峰会和论坛。组建市级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产业联盟，每年发布我市新经济白皮书、典型案例集。通过各类媒体加强对我市新经济发展政策解读、企业典型宣传引导，形成良好氛围。